

义理、考证、文章三结合的学术精品

——读徐规教授的《仰素集》

方建新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著名宋史专家徐规教授总的史学思想是务实,不尚空论。他继承、发展了传统的重“义理、考证、文章”的治史方法,成果卓著。最近出版的他的论著集《仰素集》,就是这三者有机结合的一部学术精品。

[关键词]《仰素集》;义理;考证;文章

[中图分类号]C2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6-0069-05

A Masterpiece : On Professor Xu Gui's *Yang Su Ji*

FANG Jian-xin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chief historiographical idea of Song historian Professor Xu Gui is to lay emphasis on practical work without any empty talk. He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y research method to combine theoretical and textual research with literary techniques. He has gained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s in his research work. His collected works Yang Su Ji that has been published recently is a masterpiece of its kind.

Key words: Yang Su Ji; theoretical research; textual research; literary techniques

最近,原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规先生的论著集——《仰素集》。

徐规,字民,浙江苍南人。1920年3月出生,1943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后升入该校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为研究生,1945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徐先生先后师承著名学者、史学家张荫麟(1905—1942)、陈乐素(1902—1990)两位先生。从大学时代起,徐先生就确立了以宋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半个多世纪来,他孜孜不倦,辛勤耕耘,不断探索,撰写论著百余篇(种)。这部《仰素集》,是徐先生自选出77篇(种)重加编订而成的。取名《仰素集》,是为了纪念其先师张荫麟(号素痴)、陈乐素两位先生。

徐先生是国家人事部批准的杰出高级专家,曾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岳飞研究会会长等多项学术职务。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宋史专家,徐先生总的史学思想是务实,不尚空论,因此,他较偏重于史事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力求用正确完备的史料和精炼流畅的文笔来解答一些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继承与发扬张、陈两位先生对宋史研究的业绩。徐先生十分赞赏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名言,认为做学问、搞研究,必须甘于寂寞,耐得住清贫,要专心致志。他还认为,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练好三个方面的基本功,即前代学者总结出的“义理、考证、文章”,加强才、学、识的修养。《仰素集》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正是徐先生半个多世纪在史学园地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辛勤耕耘的硕果,亦是他严谨治学,将义理、考证、文章有机结合所取得的新成就。

《仰素集》分五个部分:其一,年谱卷;其二,人物、史事考评卷;其三,文献订误卷;其四,书评、序

言卷,其五 纪念文字、会议致词卷。该书的主要篇章是对宋代人物、史事与文献典籍的研究、考订及评论,且都是经作者长年不断探索积累,又不断补充修改的精心之作。

年谱卷所收《李焘年表》,原是作者的大学学士论文,由张荫麟先生创意、指导而撰写的。该文开创了对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及其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研究之先声,曾获得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优等奖。此文20世纪60年代初经修订后,在中华书局《文史》第2辑上正式发表。以后又进行了两次修订,题为《李焘年表补正》、《李焘年表再补正》,分别在《文史》第4辑、第16辑上刊行,后被收入中华书局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其中补正稿发表于1964年,再补正稿发表于1982年,相隔近20年,重新订正13处。如原《李焘年表》中绍兴十四年(1144)条载:“四月,秦桧请禁野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李焘尝以此重得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六)。”此条记事,是根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六“嘉泰禁私史”条记事:“顷秦丞相既主和议,始有私史之禁,时李文简焘以此重得罪。”(《国学基本丛书》本同)近人金毓黻教授《中国史学史》及今人涉及此事的所有论著中都沿袭此条记事。后徐先生认真、详细地查阅、比勘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其他本子,发现光绪癸巳年井研萧氏刻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著录该条,乃作“李忠简焘”,而《适园丛书》本作“李忠简光”,非“李文简焘”。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各本卷首《乙集·序》云:“近代李庄简(李光谥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据此,徐先生又进而将此次文字狱的来龙去脉详加考证,得出绍兴十四年秦桧禁野史而获罪的是李光而非李焘,订正了因诸多典籍记载的歧异而造成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另外,再补正稿对初次发表的《李焘年表》及补正稿增补事迹七十余条。但徐先生并未到此为止,以后又继续进行增补订正。此次收入《仰素集》时,又逐字逐句作了修改。俗语云:“十年磨一剑”《李焘年表》的撰写,何止十年!它是徐先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坚持不懈的探索研究才写成的,真可谓呕心沥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文对李焘生平事迹、著作材料搜罗之完备,考订之精审,辨析之缜密,殆无可挑剔,是一篇名副其实的学术精品,集中反映了徐先生“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

与《李焘年表》相媲美的另一著作《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也是经数十年探索、积累而成的。此书撰写于文革前,文革中被迫中断,且搜集的原始材料和手稿差一点被毁,可谓历尽艰难,直到1979年完稿,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国内关于北宋著名诗人和有进步倾向的文学家王禹偁事迹及作品编年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此书按年月编排了王禹偁事迹及有关当代大事,纠正了史籍上许多记载错误,考定了王禹偁几乎全部著作的写作年代,钩沉和著录了王禹偁许多散佚的诗文,并对《小畜外集》内误收的诗歌进行了考证,补正了文集内的脱漏及误刊字句,包括影印宋本及王禹偁本人误引原文,评述了王禹偁在历史上的地位。此书出版后,得到了海内外文史学界的一致好评,被列入全国优秀著作书目,获得1978—1982年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日本国唐宋史权威周藤吉之教授(1907—1990)读了此书后,“深为赞叹”,认为“《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堪称是一部杰作”,并特地撰写了长篇书评,在日本权威刊物《东洋学报》上发表,向日本读者推荐。该书出版后,作者又陆续有所补正,在收入《仰素集》时,再次进行了校订,更臻完善。

徐规先生重视考据,擅长考据。他认为进行历史研究,首先要把事实搞清楚,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真伪杂陈,非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信史”,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徐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详细地占有材料、严格鉴别考订的修史精神与方法,在对人物、史事的探考时,求真求实,在发疑探微中纠谬解惑,还历史本来面目。《仰素集》中《“杯酒释兵权”说献疑》及《再论“杯酒释兵权”》这两篇论文,就是徐先生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关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从北宋中期开始流传,直到现代史家皆深信不疑,就是在中国古代史课本里也都是这样介绍的。徐先生的这两篇论文首先对这一事件的记载进行了考辨,发

现最早记载此事的是仁宗初丁谓(966—1037)的《谈录》与王曾(978—1038)《笔录》。此后，司马光从他的前辈庞籍(988—1063)那里听到了这则故事，把它记录在《涑水记闻》中。到了南宋前期，李焘认为“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最大事件之一，深以史书未曾记载为憾，于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建隆二年(961)七月条追述了这件事。《献疑》两文，对上述各种记载进行了考核比照，发现时代愈后，却记载愈详，且多有抵牾，尤其难以解释的是如此一件赞颂太祖的大事、好事，却不见于官修的《太祖实录》、《三朝国史》。况且，建隆二年七月，正值太祖的母亲杜太后刚去世的国丧期间，朝廷上不作乐，不宴饮，李焘考定“杯酒释兵权”事件却发生于此时，恐不足信。接着，《献疑》二文又分析了宋初收取禁军宿将兵权的经过，逐个考察了主要禁军宿将被罢的时间，发现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少数禁军宿将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前后被罢去军职外，其他的都是在这之前而主要是在这之后被罢军职的，即使被罢去了典领中央禁军的职权，有的也还继续管辖地方屯泊禁军或仍带领中央禁军出征南方割据政权。这样，就从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时间发生的可能性与宋初实际收取禁军宿将兵权的过程，对“杯酒释兵权”说提出了质疑。最后，文章又分析指出，当时北宋中央政权尚未巩固，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刚开始，宋太祖还要利用禁军宿将平定十国及防守边境，所以不会也不可能在当时就一举将禁军宿将大部罢免。这就纠正了长期以来将宋初收取禁军宿将兵权过于简单化、戏剧化的说法。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宋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得到了包括邓广铭先生与美籍华人学者刘子健先生等在内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的赞同，并被一些宋史新著所采用。其他如《沈括事迹编年》、《沈括前半生考略》、《陈亮永嘉之行及其与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宋太祖誓约辨析》等文，将宋代一些扑朔迷离如乱麻一团的重要人物与史实考辨清楚。其中有关沈括生平事迹研究的两篇论文，纠正了今人沈括研究中包括其生卒年在内的不少系年疏误。对陈亮永嘉之行，在有关陈亮研究的论著中，都认为只有一次，而徐先生考证出前后至少有三次，并进而考察了陈亮与陈傅良、叶适等人的亲密交往以及陈亮思想与永嘉事功学派的密切联系。上述三文，对推进沈括和陈亮这两位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徐规先生认为，搞考证犹如老吏断狱，一定要有坚强、充备的证据，最好能取得反证，不能单用默证，说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件事，就轻率地断定为虚假，这是很危险的方法。关于岳飞朱仙镇之役，20世纪初以来，海内外一些著名学者都持否定意见，或认为岳飞绝无进军朱仙镇之役，或认为朱仙镇之役是出于岳珂凭空虚构。其主要理由是岳珂《鄂王行实编年》及《宋史·岳飞传》所记朱仙镇之役在绍兴十年(1140)的宋高宗诏札和岳飞捷奏里，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十三处战功》三书中都没有提到。对此，徐先生在《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一文中指出，这种论证方法是需要斟酌的。这是因为有关岳飞文件与记录岳飞事迹的书籍曾遭摧残和散落，而凭不完备的资料运用默证，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文中引用岳珂《高宗皇帝宸翰跋》与宁宗时史官章颖撰《鄂王传》及其他材料证明《鄂王行实编年》所收高宗赐给岳飞诏札并未全部收入，有“轶在人家，散之族党”，另岳飞的捷奏亦有“散佚不可考者”。文章又引用翔实的资料对当时岳飞行军作战的路线、行程进行了详细考析，并证以时人及其他文献的记载，认为断言朱仙镇之役是出于岳珂虚构尚缺乏有力的反证，肯定了岳飞确有进军朱仙镇之事。这一考辨，正是徐先生在考证史迹时重事实、重证据，反对采用默证这种推测臆断方法的具体体现。

由于徐规先生在史学研究中注重考证，在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注意鉴别材料，又有一套科学的考证方法，所以，他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但言之有据，而且常能发他人所未发，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如对于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自南宋初始直至当代一些著名学者都认为，宋太祖赵匡胤改变了周世宗柴荣采取的“先北后南”的统一政策，因而坐失消灭辽朝的良机，造成了日后“积贫积弱”的局面和严重边患。《仰素集》中《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一文，则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此文分三个部分，首先，考察了后周君臣制订的统一

策略与统一行动的全过程,指出后周实施的统一战略是“先南后北”,不是“先北后南”,这是基于当时北边的契丹十分强大,还无力与之抗衡而制定的“先弱后强”、“先易后难”的方针。接着,文章分析了宋初的政治形势和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对比了宋朝同辽朝的经济、军事实力,认为“先南后北”战略是经过宋太祖君臣们认真讨论,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而制定的符合实际的正确战略,是继承了后周世宗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方针。最后,文章从宋太祖推行这一策略取得的显著成效证明了这一战略的正确。宋初统一战略进展神速,只用了1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除吴越外的统一南方各大业,并使宋朝国力大增,从而有了同辽朝抗衡并对其征讨的能力。文章分析了宋太宗伐辽及高粱河之战后指出,高粱河大败,是由于宋太宗麻痹轻敌、急躁冒进,宋军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绝不能据以否定“先南后北”战略的正确性。这一结论客观公允,令人信服。再如《浅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一反传统的将宋代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而每一时期又分为前、后期或前、中、后期的划分法,全面考察分析了宋代社会矛盾即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所呈现出的阶段性趋势,从政治史的角度将宋代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宋建国之初到太平兴国四年灭北汉(960—979),为统一和集权时期;第二个时期,自太平兴国四年灭北汉到宣和七年徽宗退位(979—1125),为变法与反变法时期;第三个时期,自宣和七年金兵南侵到理宗端平元年蒙古灭金(1125—1234),为宋金和战时期;第四个时期,自蒙古灭金到南宋灭亡(1234—1279),为抗(蒙)元斗争时期。这一分法,高屋建瓴,从总体上把握了宋代社会政治发展的脉络。

徐规先生认为,做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一条,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家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决不能图名利,赶浪头,凑热闹。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及教学中,徐先生始终坚持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一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仰素集》中《张鲁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吗?》一文,是建国以后第一篇对张鲁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的论点提出质疑与批评的论文,该文发表于1961年9月27日《光明日报·史学》中,同当时一些权威观点截然不同。这在缺乏学术争鸣气氛,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紧密联系、无限上纲上线的时代,针对这样的敏感问题,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识的,而这种勇气与胆识正是来自秉笔直书的史家美德。再如对岳飞的评价问题,文革中及文革结束初期,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认为岳飞班师是误国、愚忠的观点;与此同时,在对岳飞抗金战功的评价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虚夸不实之辞。对此,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始,徐先生相继撰写了包括上文所提及的《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及《论民族英雄岳飞》、《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我们应该向岳飞学习什么?》等论文,充分肯定岳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为抗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对岳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生活俭朴,作风正派,为官清廉等优秀品质作了高度评价。在这同时,又对南宋初年抗金战争总的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包括宋金双方的经济、军事力量对比,金朝军队进攻南宋的兵力部署、作战路线等,指出金国对南宋的用兵重点,东面是淮东、淮西(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因为南宋初皇帝行在所先是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后迁到临安府(今浙江杭州)都位于东南。西南是陕西,金兵拟由此进入四川,控制长江上游,用大迂回的战略包围南宋。而岳家军驻守鄂州(今湖北武昌)襄阳一带,交战的主要对手是实力较弱的伪齐。另据《金史》记载,金朝自己承认战败失利的几次战役都在东线与西线。所以,对于南宋初抗金诸将的战功,应该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加以叙述,不宜厚此薄彼,不可也不必要为尊崇岳飞而虚词溢美。对于绍兴十年北伐班师一事,徐先生也作了十分客观的分析,指出岳飞班师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宋金在开封地区兵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金帅兀术自顺昌战败归后,作了战略调整,为保开封,加强了该地区兵力,集中了十余万军队,而此时,近邻的张俊部先于岳飞班师,从淮北亳州(今安徽亳县)撤回至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这使得金帅兀术能够集中兵力来对付正在开封附近孤军奋战的岳家军,导致岳家军在颍昌之役中遭到金兵猛烈反击,折将损兵,陷入不利境地。而宋高宗秉承祖宗家法,深

怕武人兵权过大威胁赵宋王朝统治，对金朝只要求取得“议和”（实际上是投降）条件，维持南宋小朝廷苟安局面而已，根本不给岳家军扩充兵力。尤其是岳家军颍昌之役陷入不利境地时，其他各路宋军迟迟未予增援。所以，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班师，固然是由于宋高宗接连下诏不许深入，命令班师，但直接原因是当时开封附近地区宋金双方兵力发生变化，岳家军处于不利局面，被迫所为。徐先生的这一考察分析，既澄清了不少学者根据《鄂王行实编年》与《宋史·岳飞传》的记载，过于铺张岳家军威力，把班师原因完全归诸高宗诏命而无视当时岳家军处境艰难的事实，也有力地批驳了对岳飞班师是“愚忠”、“误国”的指责，实乃至当之论，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战功，客观真实地分析其班师的原因。

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考评、研究的同时，徐规先生十分重视对文献典籍的整理。他先后完成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系以来系年要录》等古籍的整理。《仰素集》中文献订误卷是他在这一方面的其他重要成果的汇集。这一卷共收论文19篇，订误的既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皇宋十朝纲要》、《宋史·地理志》等史籍，也有今人整理、点校的文集、笔记。涉及的内容不只是文字的校勘，还包括人物、史事、制度、历史地理及目录、版本等方面。如《宋史·地理志 补正》一文，广征博引各种文献，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8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1期上刊登的华林甫先生所撰《1998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一文，赞誉此文“堪称传世佳作”，“诚为不刊之论”。另如《全宋文 第一册读后》、《全宋文·王禹偁文 补正》两文，分别为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主持编辑的《全宋文》第一册与第四册收录的王禹偁文作了详细的订误、补正。前文指出、订正《全宋文》第一册中各种疏误109条，后文订误、补正《全宋文》所收王禹偁文300余条。条条有出处，字字有根据，从中反映出的对古代文史功力之深，学识之渊博，莫不令人肃然起敬。对此，《全宋文》主编曾枣庄先生还专门写信向徐先生表示感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仰素集》中不少订误文章，是针对当代中青年学者整理点校、列入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宋人笔记。徐先生在指出这些整理点校本的疏误时，严肃认真，发现一条，指出一条，但语气平和，就事论事，绝无讽刺嘲弄之语，其大家风范不但使被批评者口服心服，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所以，这些订误文章，不但对读者正确阅读、使用这些文献，避免以讹传讹有极大帮助，而且对提高中青年学者的古籍整理研究水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了考证严密，论断精当外，《仰素集》的文章亦堪称一流。全书文笔简洁明了，自然流畅。徐先生十分重视写好文章，经常教导学生注意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他认为，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广阔，影响深远，必须具备较好的文学修养，而要写好文章，就要选读、熟读古今一些名家的力作，要多写短文，多同师友商略，勤加修改。徐先生本人自幼好学，又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有着深厚的文学、史学修养。在写作过程中，从谋篇布局到修辞炼句，他都反复推敲，不断修改。文章写好后，又常常虚心地征求友朋的意见，甚至不耻下问，让学生们提意见。在编集《仰素集》时，徐先生对每篇论文审读再三，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样稿出来后，又多次审读，真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所以，《仰素集》中文字上绝少差讹，书中虽以考据文章居多，读来却毫无枯燥之感，每逢精彩处，往往使人难以释卷。

总之，《仰素集》是徐规先生半个多世纪辛勤治学的心血结晶，是一部义理、考证、文章三结合的学术精品，是我国史学界的一项优秀的成果，它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海内外宋史研究的发展。

[责任编辑 徐 枫]